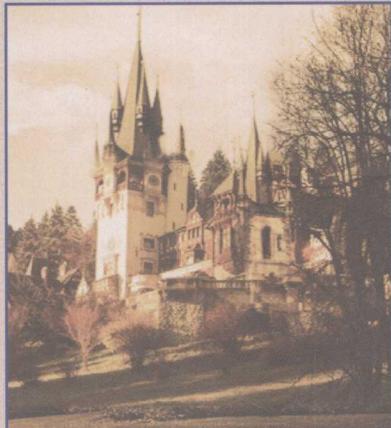




高等院校翻译专业必读系列



TRANSLATION

翻译教学研究新探

高 宁/著

南開大學出版社

014043355

H315.9

850

高等院校翻译专业必读系列

翻译教学研究新探

高 宁 著



北航

C1731522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H315.9
850

668890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教学研究新探 /高宁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4. 4

高等院校翻译专业必读系列

ISBN 978-7-310-04436-8

I. ①翻… II. ①高… III. ①英语—翻译—教学研究—高等学校 IV. ①H315.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0020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孙克强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230×155 毫米 16 开本 14.875 印张 2 插页 210 千字

定价: 31.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目 录

总 论

教与学的互动与制衡——翻译教学理念探索	3
教与学的守成与创新——以“词义与辞典”教学为例	16
教与学的目标与视野——论翻译教材的课堂重组	34

方法论探讨

读原文，还是读译文，是一个问题	49
论翻译教学、翻译研究与对比语言学的内在关系	62
汉日对比与翻译研究的关系	73
日语盲点初探——浅论日语句法与翻译教学	86

专题研究

关于同源译文的对比研究	99
有定无定与翻译	119
不守“规矩”，才成“方圆”——论拟声拟态词翻译	133
从法式港湾探寻高译之道	151
本科论文指导与翻译教学研究	162

附 录

2011 华东师大日语系翻译课补充资料	175
2012 华东师大日语系翻译课补充资料	194
2013 华东师大日语系翻译课补充资料	213
后记	232

忌 论

教与学的互动与制衡

——翻译教学理念探索

一、翻译课的性质与目标

翻译教什么与翻译课教什么，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不同翻译理念的体现，在翻译专业教师眼中有着实质性的区别。简言之，就是教学翻译与翻译教学的区别，前者是外语教学的一种教学辅助手段和检验方法，为整个语言教学服务；后者作为一门科学，有着自身的建构、系统和科学性，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教师必须思考、研究并回答这门课的性质、目的、任务及其教学法。

比如翻译课就不同于精读课，虽然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课程的性质上却有着不同的“个性”，不能混为一谈。精读课的重点是打好学生的基础，进行听说读写等方面的训练，并比较系统地讲授语音、语法和词汇方面的知识。但是，在精读课上翻译不过是一个有效的教学辅助手段而已。教师通过翻译来了解学生对外语的理解程度，同时，在词汇、语法、句型及惯用语的学习中，翻译也充当着特殊的角色，起着诠释、注解和发蒙解惑的作用。但是，这种做法却容易模糊或遮蔽掉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内在科学性。作为翻译课教师，他首先必须思考翻译课的性质和最终目的，做一名把学生引向译学之路的“专业导游”，展现译学内在学理及其魅力，在与学生互动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如果说精读课的目标就是教会学生外语，使一个完全不懂外语的人通过几年的学习，能够粗通外语，

那么翻译课是不是同样可以说它使一个原本没有翻译能力的人通过一两年的学习而学会翻译呢？

这样的说法是既正确又不正确的。说它不正确，是因为外语学习的开始就伴随着与母语的对比，就伴随着自发的、不自觉的翻译实践。可以说，翻译是一种外语学习者与生俱来的能力，并会随着学习时间的增加而不断得到加强。从这个角度看，翻译课对外语学习的贡献似乎有限。说它正确，则是因为这类翻译实践常常局限于对翻译的感性认识之上，是一种辅助性外语学习的手段，离真正的译学还有很大的距离，需要通过系统的学习使学生对翻译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使他们初步具备的翻译才能发生质的转变和飞跃，走向译学领域。这就如同人人都会说母语，但并不是人人都在研究语言，都能够去当专业语言教师一样，因为他们缺乏系统的专业知识、专业意识和专业训练。而翻译课的任务正是把高年级学生，特别是有志于从事翻译事业的人引上一条专业之路。

那么，翻译课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笔者且以自身的经验谈一点看法。20多年前当笔者刚刚走上翻译课的讲堂并着手编著第一本翻译教材时，曾经认为“在众多的翻译体系中，我们认为以翻译技巧为主线的体系比较合理，它既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又疏而不漏、易于把握。这一翻译体系，简言之，就是‘顺译、倒译、分译、合译、意译、加译、简译、变译、反译’。它们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贯通，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高宁，1995：3），并列举了相应的理由。但是，今天看来，这个看法脱离实际，不符合大学生的现状。毋庸讳言，这个教学体系是以翻译技巧教学为翻译课最终目标的，修辞学色彩浓厚，因而其前提也必然是学生的外语水平早已超越“怎样译得对”的层面，而“怎么译得好”已经上升为翻译课的首要任务。但是，随着教学时间的增加，笔者越来越感觉到学生远远没有达到专心研究“怎么译得好”——即用活各种翻译技巧的层面，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尚停留在“怎样译得对”的水平之上。因此，十余年后，笔者在编著《新编汉

日翻译教程》时做了较大的修订，改为“在翻译教学理念和方法论上做起文章。我们认为对现在的学生而言，他们最缺乏的、最需要教师传授的与其说是一个个具体译例，还不如说是指导实际操作的翻译方法论。假如对翻译的具体展开过程和展开方法知之甚少，假如对翻译的理解始终停留在感性层面而不能上升到理性层面的话，那么，即便是翻译爱好者也很难成为优秀的翻译人才”（高宁，2003：前言1），并强调“当务之急显然是提高未来的译者——现在的学生的实际翻译水平。最基础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际的翻译操作训练，学生翻译，教师讲评、修改，连续一两个学年反复进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教会学生首先从宏观的角度、从语境的角度去把握原文并进行翻译。一段文字拿到手以后，很快能抓住其基本骨架和核心意义并移植成另一种文字，……在方法论上做足文章”（高宁、杜勤，2003：5）。显然，翻译课的目标已经定位在“翻译教学理念和方法论”上。教材的整体编排也发生很大变化，翻译技巧已经被压缩成4章，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一篇幅。这个提法应该说比以往有很大进步，开始从技巧传授走向实际的操作层面，涉及翻译的更多问题，强调原文的“基本骨架和核心意义”。但是，通过近几年的教学实践，笔者意识到这个修正仍然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仍然不够彻底。2006年笔者在《日汉互译教程》第二版的修订后记中做了进一步的反省：“当年经验不足，以为翻译不过是几大技巧的综合灵活使用。近年来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尚未达到这个层次，他们的双语阅读理解力，特别是日文理解力亟待提高；双语表达力，无论是日文还是中文，都远远没有达到运用自如的地步。也许他们在理念上可以明白笔者的编著意图，不过实际语言能力妨碍他们去很好地推敲、研究翻译技巧的运用，去关注修辞层面上的译文质量”，并提出“理解是技巧之母”的翻译理念（高宁、张秀华，2006：258）。如今，笔者以为翻译课既不能以技巧传授为目的，也不宜以抽象理念为目标，注重方法论虽然有一定的

效果，但是，学生们最缺的，最需要教师培养的，同时也最有实际效果的是翻译意识。

什么是翻译意识？简言之，就是初步的专业意识+语言敏感度。所谓专业意识，即学生在动笔翻译前，能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将做什么，并自觉地从译学角度思索、揣摩自己的译文，而不是懵懂地跟着感觉走，顺着原文爬格子；同时对原文和译文都变得比以往敏感，能够用专业眼光发现其中的问题。所谓语言敏感度，研究方向不同，所指内容也不同。在词汇研究者和语法研究者眼中，语言敏感度分别指向不同的领域。但是，对翻译研究者而言，所谓语言敏感度，主要体现在对语境的高度敏感性上；任何时候都会从语境角度去思考原文字、词、句的翻译，即便一个孤句，也会在预设语境后才去讨论原文的意义及翻译。总而言之，学生在上翻译课之前，对这门课是没有理性概念的，其中很多人抱着实用的心态走进课堂。而翻译课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他们对翻译的看法，让他们意识到翻译是一门有着内在规律和系统的科学，虽然有少数骄子可以在实践层面无师自通，但是，绝大多数人不经过专业学习，不具备专业意识，是很难登堂入室的。因此，如果通过一两个学年的学习，能够树立起初步的翻译意识，把自己从懵懂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学会因时制宜地调整翻译策略和方法，就已经达到了翻译课的目的。因为学生已经在有意识地改变与生俱来的对翻译的感性认识，并且自觉地把它往理性层面提升。至于他们如何走向更高的层面，虽然是翻译课所关心的问题，但是因为课时的限制，只能更多地依赖有志者今后的“自我修炼”。

这个目标也许显得太低，但是我觉得它比较符合实际，至少反映了一部分大学日语系学生的现状。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自己也不敢面对这个“发现”，有意无意之间回避着这个话题。但是，不走出翻译教学的盲区，不实事求是地面对眼前的教学环境，就不可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他们体味到翻译课的价值和魅力所在。

二、教学方向与课程难易度

培养学生的翻译意识，笔者认为最有效的做法是从“怎么译得好”转到“怎么译得对”，让“译得对”成为翻译课最重要的话题，并借助这个话题培养起学生的翻译意识。“怎么译得好”在本科阶段应当退居到第二位，根据笔者的经验，能从中受益的学生有限。但是，这个部分却不能取消，因为它能开阔学生的眼界，使他们感悟到一些优秀的译文。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个看法，如上文所述，是出于对学生中日文双语水平和基本翻译能力的判断。事实上，“目前我国的译界现状很不尽如人意。有学者在谈论译作质量之差时‘跟朋友开玩笑说，以前做翻译批评，是找错误、错译的地方，如今做翻译批评，有的书，真的要去找‘什么地方译对了？’’”（高宁、杜勤，2003：4-5）。李芒先生曾指出“日汉翻译的主要状况是，擅长中文，且日文造诣深者较少”（许钧等，2010：33）。我认为学者的评价基本符合日语界现状。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课以“译对”为主、“译好”为辅的教学定位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明确翻译课大方向之后，下面需要思考的是具体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等问题。如今，绝大多数学校都在大三上学期或下学期开设翻译课，有日汉、汉日各上一年的学校，也有各上一学期的学校。有个别高校从二年级起开设翻译课，如台湾大学和辅仁大学日文系。翻译课开设年级不同，讲授内容，尤其是例文难易程度应该有所不同。无论哪个年级开设翻译课，都如前所述，应该从准确理解原文开始。而教材或课堂的补充例文选择有几个重要原则。一是语境原则。没有上下文的孤句不适合翻译学习。如果要讨论，也一定要预设语境，才有可能进行。换言之，只有在上下文明确、语境较为完整的句群或语段中，词汇、语法、语篇和文化层面的翻译教学与研究才能充分展开。语境原则的实质就是强调翻译教学“是建立在宏观的基础上的。即翻译的学习与研究强调从宏观入手，强调从总体上去把握原文，然后再逐渐

过渡到微观的层次上。它的特点是从大到小、从全局到局部，先见森林，后见树木。也就是说，翻译学习与研究的着眼点应该是从全文到段落、从段落到句群、从句群到句子、再从句子到词组和单词”（高宁，2002：2）。笔者反对选用孤句进行翻译教学和研究，因为它容易使翻译教学和研究蜕变成语法研究或语法教学的汉语诠释、注译。

在例文难易度的把握方面，笔者也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大约有十余年，笔者编著的教材和课堂补充例文主要选自文学作品。不少翻译教师和学生批评说过难，不适合课堂使用。主要有以下这么几个理由：选自小说的例文对原文语境的依赖过强；原文文学性太强，现在的学生既不感兴趣又理解不到位；原文用词用句过偏，超出很多学生的日语水平。平心而论，这种情况确实存在。笔者也一直在思索，到底选择什么样的例文才适合翻译课教学。以前，笔者认为文学翻译是翻译的最高层界，能够从事文学翻译，其他领域的翻译自然不是难事。现在看来，需要兼顾非文学领域的翻译，或者反过来说以非文学翻译为主，以文学翻译为辅，倒可能更切合实际。此外，笔者曾经认为选择例文“一个总原则是，所选例句应该是略高于学习者的外语水平。这样，典型才能成为典型，才能对学习者起到启发、引导，甚至是振聋发聩的作用”（高宁等，2002：30）。经过近几年的摸索，这个想法如今已经有所修正。这样的例文当然需要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对学生来说价值更大的则是他们眼中视而不见的“盲区”例文。实际上，笔者越来越意识到虽然上翻译课的同学已经学过两三年日语，但是，很多学过的词汇、语法、文化等基础知识换副面孔出现在翻译课上时，他们往往不能唤醒这些已有的知识来翻译或对参考译文的正误做出判断，他们还没有树立起翻译意识，不会从译学视角多想一下，也没有查阅参考书的意识和习惯。笔者发现，翻译中最容易出错的不是未学过的词语或语法，相反偏偏是那些早已学过的词汇和语法最容易成为翻译的绊脚石。因此，找出这种盲区里的典型例文，对学生冲击力很大，更有利子树立他们的翻译意识。那些让他们掉以轻心或不

以为然的典型例文，往往会使学生产生眼前一亮、茅塞顿开的感觉。笔者开始从目前书店里出售的配有参考译文的精读、泛读等大学二、三、四年级教材中遴选例文，尤其注重从这些原本就面向大学生的教材中选出一批日文本身似乎不难，却具有典型译学价值的例文。要言之，选择翻译教学例文，可以也应该适当降低日文本身的难度，但是，却不能降低译学意义上的典型度。

但是，另一个方面，在上述“盲区”之中，实际上还潜藏着一个日语教学的“盲点”——即包括日本人在内至今没有被充分重视的日语句法教学。追根溯源，当然是日语句法研究本身“滞后”造成的。古老的日语至今仍然缺乏一套可被现代语言学阐释并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句法系统。人们平常所说日语语法主要是由词法和惯用句型构成。因此，学生对各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是一笔糊涂账，并严重影响对日语的准确理解和翻译。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需要翻译教师去引导学生像学英语那样，去注意句子的内部结构，把握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当然，句法教学体系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在目前的情况下，笔者主张套用英汉语等语言的句法去帮助观察、分析日语的句子结构。这对学生从总体上理解、翻译日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其次，对翻译课和翻译教材来说，还有一个例文长度的问题。根据课堂教学的经验，笔者以为例文长度掌握在 100~150 字左右为宜，太短不容易保证语境相对独立完整，太长，尤其是超过 300 字的例文，既会占用较多的课堂教学时间，学生也没有足够的耐心。当然，短一点的例文，如果语境十分明确，或者教师意图就是让学生去推导、设定原文语境，自然可以用。同样，略长一点的例文，如果确有需要，也可以使用。只是这样的例文在总量上应该有所控制。再就是所选译文如果有错，但又与相关章节要讨论的内容无关时，还是以修正为好。不过，如果想给任课教师和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分析、讨论和研究的余地，不修改也无不可。但是最好任课教师或教材能给予提示。

再次，例文的选择如果能从同源译文的角度去收集、讲解、评点，会极大地有利于翻译教学。同源译文的分析、对比、研究对提高翻译鉴赏力和实际翻译水平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同源译文的比较是多方面的，包括译学领域各个层面。这样的比较研究也有助于学生打破自身的思维定势，发现翻译也如同音乐，是一个多声部的世界，并意识到修改对于翻译的重要性。同时，也会使课堂教学呈现出一波三折、柳暗花明的效果，加深学生对翻译的印象和感悟。同源译文的最大来源当然是小说和散文的不同译本，不过，近年来国内出版的精读、泛读等教材中也有一些相同的选目，其参考译文可以选为同源译文。一般说来，相差越大，价值越大，给人的启迪也就越多。简言之，一个“例句的典型与否往往还跟它有没有‘陪衬人’有关。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个普普通通的译文很可能在与‘同胞兄弟’的对比中，或黯然失色，或光彩照人”（高宁等，2002：30）。同源译文的对比和研究是翻译教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笔者认为，如果能有意识地去选择不同名家的译文或同一名家数度修改过的译文进行比较研究，则更有意义，不仅名家的译文会不同凡响，同时还为版本学等翻译史的研究提供了典型例文。

此外，近年来笔者发现回译教学法有着很高的实用价值，值得进一步推广。在汉译日教学中，可以从日本汉学家的日译本中选择一些例文，让学生译回汉语，然后与汉语原文进行对比；在日译汉课堂，则可选用国内翻译家的译文，让学生回译成日语，再与日语原文对照分析。分析的视角取决于教师选择例文的意图和目的，可以是文体特征，可以是句型句式的选用，也可以是修辞手法的异同或文章的起承转接对比。换言之，回译教学法可以用在翻译教学的各个方面。不过，这种教学法能否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译文必须源于母语译者，二是译文与原文在形态结构上差距越大越好，越不容易“复原”的译文对回译教学越有意义。因此，汉译日教学中所选日译不能出自中国人之手，不然会使“复原”的几率增大而降低学习效果。日译汉教学亦

同理。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在通常情况下，这只是翻译课上教与学的一种手段，并不能把它视为评判译文优劣的标准。

最后尚需一提的是，文化翻译的讲授与研究也是翻译课难以回避的教学内容。笔者以为一个有效的原则是，教师讲得清楚、学生听得明白的文化问题可以引入课堂，但是，教师本身讲不清楚，或学生听不（太）明白的文化翻译问题则不宜涉及。笔者以为特别不宜过分强调译坛尚有争议的文化翻译问题，其中包括一些属于常识水平的问题，如「土間」等。因为它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通常并不会全面影响翻译工作的进行。因此，如果过分强调翻译中的这类文化因素，反而有可能让学生产生不可译论之类的先入之见，而从根本上动摇军心。文化翻译中的难题本属于高层次的研究课题，对它的研究应在对翻译的基本问题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与认识之后。实际上，有些文化因素造成的翻译难题，即便是专家、学者也未必能处理好，抓住这类问题大做文章，热闹倒是热闹，但学生收获往往有限，从翻译教学的角度看是得不偿失。

三、课堂教授法与作业讲评问题

翻译课怎么教，无疑会因人而异，没有一定成规。只要能够达到教师预设的目标，都无可厚非。笔者 20 多年来也尝试过各种教法，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反省、总结。其中感触最深的有两点：第一是教材和课堂教学的关系；第二是作业的布置与讲评问题。

笔者以为翻译课不能没有教材，但也不能全盘接受，照本宣科。没有教材，教师随意性太强，学生则心中无底，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像坐上无轨电车，不知驶向何方。但是，无论什么翻译教材，也只能供教师选择性使用部分内容，最多也就是教师手中的半张牌。另外半张则需要教师自己去打造——编出属于自己的教学讲义。其中最容易搞活课堂教学的有两个内容，一是对现用教材的重新梳理，尤其是对教材的观点和例文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并引导学生对教材中潜在的

研究点——即作者业已点及但未全面展开的研究课题做进一步的考察与研究。这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而且能开阔并提升他们的眼界。二是补充一批新的典型例文，既可消弭教师照本宣科的毛病，又能成为教师手中的“新式武器”，其“杀伤力”往往不可低估。例文的选用原则基本和教材编著相同，只是数量上会少一点，这里不再重复，请参看附录。笔者多年来一直采用这个方法授课，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作业批改与讲评则是翻译教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翻译教学一般至少包括三大部分——教材讲授、补充教材讲授和作业批改讲评，除了时间不够之外，最令笔者头疼的是作业讲评效果不佳。作业通常是每次下课前布置，第2周收上，第3周内批改完还给学生并进行课堂讲评。但是，这种操作模式的最大毛病是时间拉得过长，通常至少3周，有时甚至可达一个月。据学生反映，他们做作业时缺乏“临场感”，敷衍了事者为数不少。老师讲评时，除少数认真的学生外，大部分人对自己笔下的文字已经感到陌生，有一种不在场的感觉。

这个问题曾困扰笔者十几年，始终找不出有效的解决途径。2003年开始，笔者尝试着把课堂补充例文和课后练习融为一体，即每次上课利用前20-30分钟让学生当场做补充讲义的两个例文。练习类型大致分3类：翻译、改错和同源译文分析对比。学生做作业之时，教师在教室来回走动，了解学生的作业情况。到时间后，当场评析，当场给出参考译文。这种教学方式能否成功，关键有两个。第一个是例文的典型性。第一类作业要有“一看就会，一做就错”的特点；第二类例文中要内含陷阱，让学生一时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第三类则要让学生有说不清、道不白，需要教师点拨的感觉。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些例文又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超级难题，它们只是点中了学生几处薄弱的穴位而已。听完教师的讲评，绝大部分学生会感觉茅塞顿开，获益匪浅。据笔者的经验，这样的刺激持续十几二十次之后，学生对翻译的认识才会出现质的改变，其中一部分人开始初步具备翻译意识。

其次，这种作业能否成功，还要看它是否为教师翻译教学理念的有机体现，是否为整个学期或整个学年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每次练习都是教师课前临时抓来的“壮丁”，效果会打折扣。因此，不仅需要教师提前认真备课，收集典型而适用的例文，而且需要按照教材章节或自己的思路有章法地编选补充讲义，并尽量使补充例文形式多元化以便兼作课堂练习使用。经过几年的认真准备和调整，补充讲义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后备军团。同时，对学生来说，作业的“临场感”大大加强，而教师的反馈又迅速及时，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不过，需要赘言一句的是，这种作业方式仍需要以“怎样译得对”为前提来进行，如以“怎样译得好”为指导方针，效果会差一些。

关于翻译教学，还有两点心得，一是方法论教学上要务虚，要大而化之，点到为止；一是例文讲解上要务实，要具体而微，步步深入。笔者认为在具体翻译方法论的教学上，宜粗不宜细，应该走务虚的路线，其实质是站在宏观视角给学生指导，注意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体的翻译方法本身不能定得过细，如果为学生开出具体而微的“处方”，实际上反而容易束缚住学生的手脚。即便某些日语表达方式在翻译中确实存在着“有章可循”的现象，那也不过是实际翻译中的一个选项而已，而精彩的翻译往往是突破成规的产物。换言之，任何翻译方法都不能是规定性的，也正是这种不规定性才能造就千姿万彩的翻译世界。退一步说，即便某一种日语表达方式存在着普遍实用的翻译方法，那也是让学生自己领悟才更为有效，教师的责任重在引导，而不是灌输。但是，在具体例文的分析讲解上，倒是越仔细越彻底越好。如果能像庖丁解牛一样把原文和译文的关键所在分析得十分透彻，会给学生留下鲜明生动的印象，并让他们有所触动。这无论对他们的日语理解力，还是汉语表达力都会有很大的帮助。重要的是，教师的分析一定要点到学生的“盲点”上，而不能成为又臭又长的裹脚布。